

故事里的沂蒙

民主的丰碑——袁家口子大堤

在临沂市沂南县砖埠镇，有一个袁家庄村。在这个村庄的东北河堤上，有一处著名的抗战遗址：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念碑。纪念碑始建于1941年，碑的正南面是沂蒙行署专员牟宜之题写的碑名，侧背面镌刻着牟宜之题写的“民主堤”，时任山东省战工会主任黎玉题写的“民主战胜一切”，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参议长范明枢先生的题词以及纪念碑碑文等。为什么称它为“民主堤”？它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战历史上具有怎样的意义？这座石碑到底蕴藏着怎样的故事呢？

袁家口子位于沂河与汶河交汇处。史书记载，清朝雍正八年(1730年)，沂河决口，决口处就位于袁家庄村附近，决堤的河水从袁家口子一直向南泛滥到下游的沭阳村，才又重新汇入沂河。自那时起，每到夏季山洪暴发，两河之水同时暴涨，经常会在沂河西岸的袁家庄东部决堤，导致下游三十多个村庄长年饱受洪灾所扰，苦不堪言。二百多年来，无论是清政府还是民国政府，都没能帮助当地百姓解除水患。直至共产党、八路军的到来，才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

日伪军的频繁“扫荡”和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纪念碑除了个别地方字迹不清晰之外，基本完好无损。

碑文记载：“在敌后战斗环境与春荒严重期间，而能克服困难，竣此巨工，实为我民主政权对民众利益关怀之切及民众有坚强组织与伟大力量之表现。”在大堤的修筑过程中，没有那么多的现代机械和器具，有的只是简单的斧头、锤子、铁镐等工具，以及群众勤劳的双手。当时山东省战工会财政十分困难，又赶上严重的春荒，日伪军“扫荡”频繁，随时来犯。老百姓连饭都吃不上，命也随时有可能丢掉。可就是在这样的生死危难之际，党政军民却能够拧成一股绳，投入到建造大堤的洪流中去，竣工后，老百姓还自发地爱堤护碑，他们靠的是什么？

当年，党领导的各级政府根据地进行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实施了一系列扎扎实实的民主举措与民生实践，正是这些举措、实践，使根据地的群众真正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站在百姓头上的“官”，即使战事危急，工具落后，各级党政军干部依然与群众拧成一股绳，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建造大堤的洪流中；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蹲在机关里的“官”，各级党政军干部深入群众，倾听呼声、关心疾苦、保护群众利益，行军不踏青苗、拴马不啃树皮、打铺不用牛草……一件件小事展现了亲民爱民本色；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贪污腐败的“官”，大堤修建账目公开镌刻，物资精确到斤、钱币精准到分，较真的数字背后是党和军队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这也让根据地的老百姓真实感受到了当家做主的幸福感，感受到了党对人民利益的真切维护。正如碑文中所讲：“自我民主政权树立以还，兴利除弊，不遗余力，对此攸关民生之举，奚能漠然置之？”也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会铁心向党，坚定跟党走，才会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修建起了这座民主大堤。八十余载寒来暑往，这座纪念碑仍矗立在大堤的旁边，静默地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



袁家口子大堤落成纪念碑。

1941年，正处于抗日战争的相持阶段，日伪军不断对山东根据地的大规模“扫荡”，并且实施野蛮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根据地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难状况。但是，为根治水患，彻底改善根据地群众的生活，这年4月，负责统一领导全省抗日民主政权的中共山东战工会还是毅然决定，修建袁家口子大堤。

修堤工程由沂蒙行署专员牟宜之、临费沂边联县县长尚明负责，边联县财粮科长刘约三做具体工作。修堤期间，沂蒙行署多方筹集资金15400元，组织民工65000人，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一边严防日伪军的偷袭，一边加快施工，奋战三个月，筑起了5000多米的防洪大堤，其中土堤长4730米，石砌堤长308米，底宽4米、顶宽1米，高6米，彻底根除了水患，被群众称为“百年大堤”。

大堤竣工后，特立石碑，以作纪念。石碑为六棱柱体，通高3米。碑身高1.90米，六面皆有镌文，每面宽0.38米；碑帽呈苇笠状，笠帽六角，帽顶圆尖；碑身碑帽完美组合，直立成一个劳苦大众之形象。纪念碑落成之后，每当日伪军“扫荡”时，群众就会自发地用柴草把这个纪念碑掩盖起来。所以，此后多年，虽然遭遇

顾地投入到建造大堤的洪流中；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蹲在机关里的“官”，各级党政军干部深入群众，倾听呼声、关心疾苦、保护群众利益，行军不踏青苗、拴马不啃树皮、打铺不用牛草……一件件小事展现了亲民爱民本色；认识到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贪污腐败的“官”，大堤修建账目公开镌刻，物资精确到斤、钱币精准到分，较真的数字背后是党和军队廉洁自律的工作作风，这也让根据地的老百姓真实感受到了当家做主的幸福感，感受到了党对人民利益的真切维护。正如碑文中所讲：“自我民主政权树立以还，兴利除弊，不遗余力，对此攸关民生之举，奚能漠然置之？”也正因为如此，老百姓才会铁心向党，坚定跟党走，才会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候，修建起了这座民主大堤。八十余载寒来暑往，这座纪念碑仍矗立在大堤的旁边，静默地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沧桑巨变。

每一脉山水，都有属于自己的岁月留痕。“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感人事迹，给后人留下的，不仅是改造大自然的宝贵产物——大堤和石碑，更是给老百姓心中留下了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一座民主的丰碑！



史弼画像

□宫玉河

史弼，字公谦，陈留郡考城人，东汉官员，少年好学，节操高尚。后出任州郡，征辟公府，累迁北军中侯、尚书、平原相、河东太守。

清代光绪年间的《山东济南府平原县乡土志辑稿·名宦》记载：“史弼，字公谦，陈留考城人。桓帝时，出为平原相。会诏书：下举钩党，郡国所奏，多至数百，弼独无所上。诏书迫切从事，坐传责曰：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理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划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良善，则平原之人，尸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遂举奏弼。会党禁解，弼以俸赎罪得免，济活者千余人。”

考城，东汉汉章帝时称留县置，属陈留郡，治所在今天河南民权县东北。当时，青州统辖六郡国，治所在现在的淄博市临淄区，六郡国分别为济南郡、平原郡、乐安国、齐国、北海国、东莱郡。

汉桓帝下诏“下举钩党”，青州的六个郡国有五个都上报了，唯独平原郡的平原相史弼抗旨不办。即便在皇帝派钦差面对面问责时，史弼依然用“水土异”“风俗不同”来解释。史弼还说：“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也就是说，“如果顺着钦差的意思，那么平原郡的人，人人都是‘钩党’，包括我在内。”

钦差眼看史弼“顽冥不化”，即举报治罪。恰在此时党禁解除，侥幸逃过一劫的史弼得以用俸禄赎罪，免于死。

“党锢”亦作“党固”，汉桓帝时，宦官专权，士大夫李膺、陈蕃等联合大学生郭泰、贾彪等，猛烈抨击宦官。这些宦官诬告他们结为朋党、诽谤朝廷，李膺等二百余人遭捕。李膺等人后来虽被释放，但终身不许做官。到汉灵帝时，李膺等被重新起用，与大将军窦武谋诛宦官。事败，李膺等百余人被杀，并被陆续处死、流徙、囚禁六七百人。此事记录在《后汉书·党锢传》里。

在这一背景下，东汉永康元年，朝廷颁行诏书到各地，命令纠举“钩党”，即与李膺等“党人”有牵连交往者。

即便皇帝几次下诏平原郡所在的州郡，髡笞(断发、用笞极责打)办案的掾史属吏，派使臣专程到平原问责，史弼却坚持说不能顺承上司、诬陷良善。使臣大怒，当即收捕该郡的副职官吏，向朝廷劾奏史弼办案不力。

汉桓帝、汉灵帝二帝之前，宦官、外戚虽然专权，但有名臣陈蕃等人主持朝政，士大夫、豪强等心向朝廷，局势尚未到不可收拾的境地，即《后汉

书》中所说的“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但两次党锢之祸后，清正的官员不是被害就是被禁锢，宦官更加为所欲为，残害百姓，因而激起民变，酿成黄巾起义。黄巾起义以后群雄并起，东汉最终走向灭亡。

抗旨处理“钩党”，保护无辜属下，史弼不是一次偶然表现。其实，史料还记载了其不畏权贵的另外一面。

汉桓帝的弟弟、渤海王刘悝，平日肆无忌惮、骄奢淫逸、不守规矩。史弼怕他为乱并连累皇帝，就冒死给汉桓帝上书，极力劝解汉桓帝约束弟弟的行为，以免酿成大错。汉桓帝因念及骨肉至亲，不忍查办，后来刘悝竟犯逆谋罪，贬为鬲陶王，这也应验了史弼的先见和胆识。

史弼升任河东太守后(河东郡，秦朝初期置郡，治所在今山西夏县)，奉诏举孝廉，中常侍侯览派人送信说情，并且要求借盐税，多日不被接待。送信的人说有别的事情谒见史弼，借机把侯览的信送给史弼。

史弼看到信后，愤怒地说：“太守身当重任，当选士报国，你是什么人，这样欺诈无体统！”命令侍从把侯览带出去，打了几百大板。侯览大为怨恨，假造诏书，诬蔑史弼诽谤朝廷，命人用囚车将史弼送入狱。

得悉这个消息后，那些曾受到史弼保护的平原郡官员奔走相告，向朝廷申诉。前孝廉魏勋打扮成家僮，看护史弼，还有人把房产卖了，向侯览行贿疏通，才使得史弼得以减罪。

等到史弼归里后，即托病闭门不出。他多次被公卿推荐，议郎何休也称赞史弼有治国才能，当任宰相之职，皇帝这才将其征召任为议郎。东汉光和年间，史弼被任命为彭城相(彭城，今江苏省徐州市)，因病卒未能上任。

在平原郡治所的德州市平原县，早年建有史弼纪念馆，明万历年间的《平原县志·艺文志》记载了周汝观的诗《谒史公弼祠》：“忆自桐江理钓纶，东京气节并嶙峋。群豪新庆龙门御，常侍高吹虎穴尘。纾患千年传盛事，株连五郡更何人？萍踪俯仰怀先哲，桂馥秋风一帐神。”周汝观是浙江鄞县人，明朝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七年任平原知县，后升南京刑部主事。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时”。南朝宋时期著名史学家、文学家范曄评价史弼时说：“弼为政特挫抑强豪，其小民有罪，多所容贷。”蔑视权贵，包容小民、不畏强权、同情弱者，所以后人记住了史弼。

(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德州市政协文史专员、德州市党史方志专家库专家)

【故地往事】

刚正不阿的东汉平原相史弼